

大 本 堂 考

汪 桂 海

1998 年 12 月,国家图书馆发行了首套藏书票集《北京图书馆藏书票》,内容为馆藏部分善本书中的历代皇家和中央官府藏书印鉴。其中第五枚藏书票采用的是“大本堂书”这枚藏书印鉴,因编纂时考证的疏漏,误认此印为宋内府收藏书籍、字画之印鉴。不久前,《文献》2000 年第 1 期刊登了子厚《藏书印鉴小考》一文,引据明郑晓《今言》第三百三十一条,考证清楚大本堂是明朝初年建立的,地点在今天的南京。朱元璋敕建大本堂,目的是要聚藏古今图书,延名儒教授太子、亲王。“大本堂书”这枚印记绝非宋印而为明代大本堂公藏之印。子厚的意见无疑很正确。

实际上,有关大本堂的史料不止郑晓《今言》这一条,明清时期相继成书的几种明史著作中有多处对大本堂的记载。通过这些史料,可对明初大本堂有更为深刻细致的了解,能够知道大本堂具体是何年何月所建、建立的机缘、它的藏书特点、有无其他功能以及大本堂印鉴的演变等问题。下面就利用这些史料,谈谈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粗浅认识。

最早提到大本堂的史书是《明太祖实录》,该书卷三十六上记载:

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朔辛丑,宴集东宫官及儒士,各赐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

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上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是日，上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乃自作《时雪赋》，故有是赐。

根据这一记载，大本堂建于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初四）之前。这比郑晓《今言》中仅说“洪武初”要具体得多了。

继《明太祖实录》之后成书的明吕本（1504—1587）编《馆阁类录》（有万历二十五年王元贞刻本）也记下了这件事。该书卷十二《东宫官属》云：

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朔辛丑，宴集东宫官及儒士，各赐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上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士文无虚日。是日，上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乃自作《时雪赋》，故有是赐。

这一段材料与《明太祖实录》相比较，仅“评论士文无虚日”与《实录》的“评论文字无虚日”在用词上小有差异而已，对句子的含义无根本影响，其余的文字则完全相同。《馆阁类录》是一部专题资料类编性质的书，其中的史料多与《明实录》相同或相近，知其所据主要为《明实录》。这段材料源自《太祖实录》似也无可怀疑。

明末清初，查继佐（1601—1676）撰写《罪惟录》102卷，是一部私修明史。书中《列传》第三为《皇太子标传》，同样提到大本堂，原文如下：

洪武元年册为皇太子。……凡东宫师、保、傅，诸勋旧大臣兼领之。特置宾客、谕德等官，辅成德性。选国子生国琦、王璞等十人侍禁中读书。已，又令朝廷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会大本堂成，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后征四方名儒，伴读太子及诸王，分番夜直，间与赋诗，商榷政事。

案：选国子生十人侍太子读书是在洪武元年二月庚午（二十九日）。这段文字的意思似乎是：在选国子生十人侍太子读书之后，即“令

朝廷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这时，大本堂恰好建成。如此，《罪惟录》关于大本堂建成时间的记载也是洪武元年，这一点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段材料中，“令朝廷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这件事并非洪武元年发生的，最早的一次已是洪武五年。《明史·太祖纪》洪武五年十二月辛巳，“命百官奏事启太子”。后来到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又下一次诏令，“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查氏在此处淆乱了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应予纠正。

清代编纂的《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三《兴宗孝康皇帝》记载：

（洪武元年正月，册立朱标为皇太子。二月庚午，）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自作《时雪赋》，赐东宫官。

清初官修《明史》，主要依据的是明代修的实录、邸报、方志、文集和各家私史，实录为《明史》编纂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朱标传中的这段文字很明显也是取材于《太祖实录》。但由于材料取舍、融铸过程中的疏忽，关于大本堂建立时间造成一些偏差。《实录》中在“先是，上建大本堂”一句之前，叙述的是洪武元年十一月的事情，如此，大本堂的建立应是在十一月之前。而在《明史》中，则将“先是，建大本堂”紧接于二月庚午选用国子生侍太子读书这件事之后，则大本堂之建当在二月之前，两者的时间底限相差半年之多。后者显然是错误的，修史者在采用《实录》这条资料时，忽视了应将“先是”之“是”所指代的时间点作一番交待，致有此误。

事实上，大本堂确实建立于洪武元年十一月之前，而非二月之前。清陈鹤（1757—1811）撰《明纪》卷二云：

洪武元年十月，建大本堂，命魏观侍太子说书及授诸王

经。

这则材料虽然很简短，却是目前见到的有关大本堂建立时间最为具体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大本堂建立的确切月份。这一时间与《明太祖实录》等书反映的情况也相符，应是正确的。

朱元璋出身布衣，早年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但他明白读书受教育的重要意义。参加起义军尤其是领兵之后，对读书人礼敬有加，这是他能够挫败群雄，夺取天下的一个原因。到至正二十年（1360）时，他已开始考虑自己下一代的培养教育问题。《馆阁类录》卷十一《东宫讲读》云：“庚子岁（1360）闰五月丙辰朔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世子受经学。”为儿子朱标延请名儒宋濂等讲授经书。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称吴王，他在新建的宫殿中为诸子安排了专门读书的场所。《馆阁类录》卷十一记载：“吴元年四月丙午朔庚戌，上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说明这时朱标等人的读书之处设在白虎殿。数年后，朱元璋登基称帝，朱标册为皇太子，太子与诸皇子读书的地方又作了更换，改在文楼。《馆阁类录》卷十一记：“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丙戌，上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又记：“二月壬寅朔庚午，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所谓读书禁中大约即指在文楼读书。文楼属禁中建筑之一，位于奉天殿左侧，此时专供太子等人读书。直至同年十月，大本堂建成，太子及诸王才自文楼搬到大本堂读书学习。可见，大本堂是朱元璋为教育诸子，在几经迁换之后，新确定的一处皇家学堂。

大本堂的建立是朱元璋培育权力继承人的需要，也与明军攻占元大都，获得一大批元朝收藏的宋、金、元三朝典籍有关系。洪武元年，明军在徐达、常遇春统率下北伐，八月攻入大都。入城之后，即封存了元朝皇家和中央官府藏书。到十月十七日，鉴于大都已平，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中提到：“（元朝）秘书监、国子监、太

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仪卫，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赴官送纳。”（《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说明元朝皇家及中央官府的藏书在此之前已下令收集运回应天府，这一次则意在访求、搜集那些因兵乱而散落个人手中的典籍。这些图书典籍集宋、金、元三朝旧藏，十分丰富。它们被运回应天后，大部分入了文渊阁，供朱元璋利用，另有一部分纳入大本堂，供太子及诸王学习使用。这是大本堂建立的一个机缘。

大本堂的藏书大部分来自从元大都带回的宋、金、元三朝旧藏，也应有此前此后由民间访求来的。保存至今的《洪范政鉴》是目前所知大本堂藏书中的幸存者。此书原为南宋孝宗时内府抄录并收藏之本，每卷分上下，凡为子卷二十四，朱丝栏，左右细线无边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每卷首尾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皆南宋内府所钤。当年，元军攻下临安，此书与其他宋内府典籍被一同抄掠至元大都，成为元朝皇家插架之物。入明，又南行运至应天，归入大本堂收藏。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明正统七年正月，“南京所有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宋本《洪范政鉴》得逃此劫，当是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时，被选中并装入书柜，运到了北京。

作为皇太子与诸王读书之处，大本堂的藏书目的十分明确，即专为便利太子、诸王读书之用。这也就限定了它的藏书范围。《馆阁类录》卷十一：

洪武二年夏四月乙丑朔己巳，命博士孔克仁授诸子经，……上谕之曰：……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同书卷十二：

洪武四年闰三月甲寅朔乙未，上谕台省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官僚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

可见朱元璋对太子、诸王的读书范围是有限定的，主要为传统经书和史书。因为这类书籍中蕴涵有封建社会统治者治国、治民所需要的理论法则，以及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朱元璋身为新建政权的开国皇帝，对学习借鉴这方面的知识非常重视，对下一代更是着意培养学习此类“实学”。至于诗词歌赋一类的词章之学，则视为末学，是文士之技，非治国理民者所亟，因此他不鼓励皇太子及诸王在其上花费精力。

据此，传统儒家经典若《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定属大本堂插架之物。今日之二十四史，在明初已流传有二十二史，洪武三年，《元史》的编纂也匆匆完成，加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些史书也应是太子及诸王的必读书。此外如《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自问世之后就一直是帝王们经筵上的重要书籍，朱元璋也自然规定其为太子、诸王读书之首选。

有关记载涉及到太子及诸王所读的书，确实是以经史类为主，如：《馆阁类录》卷十一提到吴元年朱元璋看见诸子中有人正在读《孟子》；又洪武元年，朱元璋曾问朱标最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朱标回答说：“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同书同卷又记洪武十二年三月初一，朱元璋到华盖殿，皇太子朱标侍立在旁。朱元璋询问近日讲习何书，朱标回答说：“昨看书至商周之际。”他读的似是《史记》中的《殷本纪》、《周本纪》。又如《罪惟录》列传三《皇太子标传》：

太子事（宋）濂最谨，潜心六经。读《左氏传》，苦诸国之事杂见，濂等以太子意，取诸国次第分系之，题曰《春秋本末》。尝持《豳风图》示濂，曰：“此周家王业所自始，为一言图后。”濂曰：“愿殿下此心朝夕如览图时。”太子跽受教。

这则材料明确提到朱标“潜心六经”，说明经书乃其必读之书。同时还说明朱标读经史书时另有相关辅助性书籍，这类书便于理解掌握所阅读原著的内容。《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詹事府”：

詹事统掌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凡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

知《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确为太子必读之书。

《明纪》卷四：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令儒臣为太子讲《大学衍义》。

明朝是取代元朝建立的一个政权，对元朝的亡国教训，朱元璋多年之后记忆犹新，未敢忘怀。他也时常提醒将来的政权继承者注意从记载前朝历史的书籍中吸取教训。《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

洪武四年三月庚子，上命皇太子观《元史》世祖时事，告之曰：“世祖虽能立国，而制度甚疏阔，礼乐无闻，故政事不及汉唐，况能复古乎？”

可见，大本堂的藏书确实是以经史类为主，有传统的经典，有新编纂的史书，也有辅助阅读经史原著的书籍。朱元璋有时指示太子的官属采摭经史之中古人已行之事可为鉴戒者，编次成集，供太子等朝夕观览，以广智识。因此，大本堂中经史类编性质的书籍也有收藏。至于诗词歌赋方面的书籍，在大本堂大约收藏甚少。可以说，专门收藏培养皇太子和诸王的学习用书，是大本堂藏书的一个特色。

洪武初，大本堂不仅是收藏图书，供太子、诸王读书之处，当时，东宫官属朝贺太子也在大本堂举行。朝贺礼仪是洪武元年制定的。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记载：

洪武元年十二月丁卯朔壬申，定三师朝贺东宫仪。上以东宫师傅皆勋旧大臣，当待以殊礼，朝贺东宫难同庶僚，故命礼官考古定议。于是，礼部及翰林诸儒臣议曰：“唐制，群臣朝贺

东宫，行四拜礼。皇太子答后二拜。三公朝贺，前后俱答拜。近代，答拜群臣之礼不行，而三师之礼则不可不重。今定拟其仪：凡遇大朝贺，前期设皇太子座于大本堂，设答拜褥位于堂中，设三师、宾客、谕德拜位于堂前。赞礼二人位于三师之北，内赞二人位于堂中，俱东西相向。至日，皇太子常服升座，三师、宾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赞礼唱，鞠躬拜四拜。皇太子受前二拜，答后二拜。礼毕，皇太子还宫，三师以下以次出。

参加朝贺礼的除赞礼、内赞等执礼官外，主要是太子的三师（师、保、傅）、宾客、谕德，这些人多为勋旧大臣、名儒硕学。为表示对太子师傅的特殊尊敬，以与普通官僚区分开，才参照前代仪轨，制定了这一礼仪，并专设在太子读书受教的地方——大本堂举行。

我们现在见到的大本堂藏书印鉴是“大本堂书”。但最初朱元璋向皇太子朱标颁赐过的大本堂印鉴并非此印，而是“大本堂记”。《明太祖实录》卷六十，洪武四年春正月己丑（初五），“制玉图记一，赐皇太子，其制蟠龙为纽，方阔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文曰‘大本堂记’。”明人郑晓《今言》中提到的“上为大本堂记”，即是洪武四年正月这件事，《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三《兴宗孝康皇帝》也记载了此事说：“（洪武）四年春，制大本堂玉图记，赐太子。”古书中的“图记”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指地理志，一指印章（参见《辞源》“图记”条）。此处的“图记”为后一含义，指印章，玉图记是玉制的印章。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在“大本堂玉图记”左侧标加了书名专用线，将“大本堂玉图记”误认为是一篇关于大本堂图画的题记。

既然朱元璋向皇太子朱标颁赐过“大本堂记”印鉴，那么，“大本堂书”与“大本堂记”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大本堂记”是皇太子朱标最早使用的一枚印章，后来此印停用，改赐“大本堂书”一印。理由是《明太祖实录》在记“大本堂记”的形制时，说是“玉图记”，

“其制蟠龙纽”。但明代印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御宝才是玉质蟠龙纽。《明史》对此虽未记载，但50年代末明定陵出土嘉靖皇帝、嘉靖皇太后，孝端皇后三方陪葬用的木质谥宝都是龙纽。结合历代帝王用印都是玉质龙纽这一传统制度，推断明代皇帝御宝是玉质蟠龙纽，当是可信的。皇太子的印章是金质龟纽，这在《明史·舆服志》中有明确记载。“大本堂记”为玉质蟠龙纽，明显与今天见到的史书所载皇太子的印制不合，而且是超出了史志记载的太子印质和纽制的规格。造成这现象惟一可能的原因，应是洪武初期印制尚未完全确定，后来才予以规范，将玉质龙纽降格为金质龟纽。这次印制的变更规范，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一点类似迹象，例如，《明实录》记“洪武四年正月戊戌（十四日），制玉图记二，俱以蟠龙为纽，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广运之记’，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赐中宫，文曰‘厚载之记’。”根据这段文字记载，朱元璋新制两方玉质蟠龙纽的印章，“厚载之记”是赐给中宫皇后的，“广运之记”归谁所用，未作特别交代。此印方一寸五分，规格高于“厚载之记”和九天之前赐给太子的“大本堂记”，后二者均方一寸二分，显然应是朱元璋自用。但朱元璋御用的这方印章在《明史·舆服志》中没有记载。《舆服志》说“明初宝玺十七”，并罗列了其中的十六种，即“皇帝奉天之玺”、“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彰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这十六种御用宝玺中，只有一方“广运之宝”在印文上与“广运之记”相近。从明帝王御用宝玺称“宝”不称“记”来看，前者应是在洪武年间印制规范中为后者所取代了的。

大本堂作为太子读书受教育的场所，其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后来太子朱标读书改在文华堂。《明史》卷三十一《礼志》九“东宫出阁讲学仪”条下说“太祖命学士宋濂授太子、诸王经于大本堂，后于文华后殿”，卷七十三《职官》二“詹事府”也说：“洪武初，置大本堂，

供太子、亲王读书。已而，太子居文华堂。”文华堂当是文华后殿之名。

太子朱标迁至文华堂之后，诸亲王也从大本堂离开，回到各自府第读书。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二十称：“国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亲王。……其后，皇太子读书在文华殿，而亲王则出就所居府。”

太子朱标何时改在文华堂读书，史书未作明确记载。《殿阁词林记》卷十云：

洪武六年，开文华堂于禁中，以为储材之地。诏择乡贡举人年少俊异者，俾肄业其中。正月甲寅，选河南第一人张唯。……受命入堂读书。诏赞善大夫宋濂、正字桂良等分教之。上谓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辅。卿等勉之。”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日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主，（张）唯等待食左右。

可见，文华堂之开设，始于洪武六年。赞善大夫宋濂、正字桂彦良皆为太子师。挑选年少有才学者入堂读书，实际上是让他们充作太子的伴读。这说明太子朱标是在洪武六年改至文华堂读书的。从洪武元年十月至六年正月，太子在大本堂读书仅五年有余。

文华堂在明初是一处重要的皇家藏书楼，明代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记载：“圣祖初定天下，即遣使求遗书。国初，四库之书多藏文华堂。堂在禁中，抵奉天门不百武，车驾常幸临之。”太子离开大本堂之后，大本堂的藏书作为太子的学习用书，大约也随之搬至文华堂，汇入文华堂原有藏书中。这样，大本堂作为藏书之地的功能也就随之结束。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善本部